

當然，「不適」、「不義」甚至「不利」，都是混雜在每個人的生活中的。如何反思、區辨、持續前進，是個重要的課題。我一直認為，性別實踐之所以必要，即在於位處邊緣的弱勢團體向主流社會的批判，以促使社會朝合理方向的轉化。若只見對自己的「不利」，而不見對社會的「不義」，恐亦非原來性別實踐之初衷。在本專題中，欣見少數人的執著，及甘之如飴地實踐。只是，性別結構的轉化過程，實在是複雜，但也是趣味盎然的過程啊！（2003年4月18日收件，作者為東吳大學心理系教授）

• 作者及主編回應 •

請認真傾聽女人的聲音

畢恆達

1970年代美國的男人受到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的衝擊，不得不重新反思男人的結構位置與性別態度。從保守的福音守望（Promise Keepers）、男權運動，到同性戀解放運動、激進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男人團體，呈現百花齊放的情景。男性研究也在同時應運而生，其中男性研究的重要讀本之一 *Men's Lives* (Kimmel & Messner 編) 今年七月也即將出版第六版了。加拿大的男人則在1991年發起白絲帶運動，架網站、辦活動、出版行動手冊，影響遍及全世界。北歐這個性別觀念先進的國度，則有許多地方性的男性團體，舉辦工作坊、教育課程，撰寫教材等，致力於性別結構的改善。反觀台灣，男性研究的歷史大約十年，而具有女性主義觀點的常設男性團體則仍然闕如。

從事多年的性別教育之後，與國內其他的性別教育者都深有同感，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男人參與性別改造的運動。〈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一文，即是初步的嘗試。寫作之初，搜尋西方相關文獻，原以為以西方世界三十年來的運動與研究成果，應該很容易找到許多探討男性性別意識形成的文獻，沒想到竟不多見。不過，許多討論男性團體或男人與女性主義關係的論文，給我很大的啟發，加深我討論研究發現的可能。

論文刊出之後，閱讀多篇誠懇、批判又有建設性的回應文，給我更進一步檢討此篇論文的機會。洪久賢指出家庭的重要性，然而家庭正是父權/男尊女卑思想烙印最深之處。有些受訪者眼見母親受暴，然而同情母親容易，改變父親難（所

以有女性主義者提出「易子/夫/父而教」的策略）。有的感受到自身與姊妹的待遇有所不同，但是真要放棄自己的特權，需要很大的決心。事實上，家庭與公共領域不可分割，男人在職場上具有結構優勢，所以在家中地位可能較高；女人承擔家務育兒工作，無法像男人一樣心無旁騖全心投入工作，也可能影響工作表現。公共空間中安全的顧慮，又阻礙了女人活動的機會。不過，如果男人不把女性主義當作一種外在、用來談論的知識，那他在家庭中的具體性別實踐會是最好的考驗。

蔡篤堅質疑「啟蒙是否一定要靠當代女性主義的論述才有可能？」此論文的受訪者普遍教育程度偏高是事實，不過我還是認為男性性別意識形成過程中，女性主義論述介入是必要的。絕大多數的男人都是平凡的，再加上男人處在相對優勢的性別位置，很難僅靠對於日常生活的內在反思，就會形成性別意識。當然，女性主義論述並不僅指涉大學裡所開設的女性主義課程，論述可能是書籍（如女性傳記）、電影（如「時時刻刻」）、演講、報紙的讀者投書。而且通常要長期接觸相關論述，才能逐漸思考、形成意識。等到女性主義漸漸植根於台灣的常民生活時，也許男人會有更多覺醒的可能。

接著他認為個別的生命歷程如何產生一個不停的折衝與協商的過程，在我的論文中並不清楚。我想是的，這篇論文比較集中在意識覺醒與形成的條件與情境，至於有了性別意識之後會如何，當真是下篇論文要處理的重點了。男人具有性別意識，會因此獲得何種鼓勵與特權，又會遭受何種挫折與打壓，如何處理人際關係以及自我反省與實踐，改變的過程為何，都很值得進一步從事有系統的分析與探討。但是當我說性別意識沒有固定的階段，是一個協商折衝的過程時，這個論斷也非憑空而降，或者由西方文獻直接移植。根據研究資料發現，我在結論中寫道：

「有的人因為熱心參與婦女運動，卻遭受女性女性主義者質疑甚至嘲諷；有的人不願意接受傳統男性角色的安排，放棄學醫，沒有想到這正是女朋友家長反對他們交往的重要因素；有的人毅然決然的選擇就讀婦女研究，沒有想到這個學位無法幫助他找到適當的性別相關工作，卻成為尋找其他工作的阻礙；在這樣的過程中，他們不時要重新思考自己與女性主義的關係，調整下一步的行動。」

舉例無法窮盡，真的有待下篇論文詳論了。

寶嘉認為我的論文很可能讓有心人士故意解讀成性別運動參與只不過是娘娘腔與同性戀用來遂行個人私怨的，因此提醒我寫作論文時應該格外小心，以免削弱男性性別運動參與的正當性。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分析與提醒，我也很想知道

會有多少的男性讀者有相同的解讀與顧慮，又會有多少女性讀者想要連結娘娘腔與同性戀成為作戰的盟友。寶嘉一方面承認「個人的性別意識可能存有多重向度且在形成上亦非單純的線」，而娘娘腔與同性戀是受訪者諸多條件之一而已，他並不擔心有人刻意解讀成具有性別意識的男人只不過是一群為了受暴母親而報仇的人罷了，卻極擔心「性別意識者（運動者）=娘娘腔=同性戀」這個鍵結的成立，會讓有心人士因害怕污名而卻步不前。如果能夠進一步進行閱讀徵候的分析，也許能夠對男性性別意識的議題有更深的理解。而我只是不解，如果同性戀與娘娘腔是污名，如果懼怕有心人士刻意的誤讀，如果為了吸引那些很 man 的「正常」異男參與性別論述，研究者就應該隱藏娘娘腔與同性戀的存在以免嚇壞了「壯異男」嗎？想想看有多少女同志站在婦女運動的前鋒，而又有多少娘娘腔（sissy gay）在石牆運動中用肉身與體制直接衝撞？我覺得真正的女性主義不只是反父權體制，也反對各種形式的宰制與壓迫。女性主義不只是看到女人作為群體受到壓迫，也會看到女人之間的差異。更何況同性戀恐懼、強迫異性戀機制與厭惡女人都是異性戀父權運作不可分割的機制。壯異男如果看不到 sissy/gay 如何受到（異性戀）父權的壓迫，恐怕同時也就不容易看到女人受到壓迫，更遑論看到自身所在的特權位置。我和寶嘉素不相識，但是從他的回應文中，得知他對於師院教育以及男性處境有很深刻的自覺與反省，希望在男性研究的路途上能夠有更多的機會相互對話與扶持。

簡成熙認為在台灣的性別生態下，「帶著性別警覺意識同理部分男性，並增進其福祉的立場」，並不會深化兩性的對立，反而可以吸引更多的男人參與。我想我並不反對傾聽男人的苦，只是男人說完之後，也請不要忘了請男人傾聽女人的經驗。西方的經驗告訴我們，一群男人關起門來彼此訴苦，輕則以為女人很苦男人也苦，所以一筆勾消，性別不是問題；重則可能認為男人為女性主義所害。在這裡我想有幾個觀念必須加以釐清：男人如果覺得受到限制與壓迫，請把對象指向（異性戀）父權體制，而不是女性主義。再則，性別的問題不只是人的價值觀與態度的問題而已，它同時是性別/物質結構的問題。所以除了性別刻板印象的破除，還必須致力於結構（經濟、工作、法律）問題的改善，才能真正促進性別平等。

另外，蔡篤堅指出我在原文第 70 頁中列出國中校名，「有可能使匿名訪談者身分曝光的疑慮」。其實 70 頁那一段敘述，是引自達努巴克（2002）在《感謝那個性騷擾學生的男教授》書中的自述，他並非我的受訪者。書籍既已出版，自是沒有曝光的疑慮。

還記得幾年前曾和國內幾個關心性別的男性研究/運動者談到成立男性成長團體的困難，我們長嘆一聲之後也就沒有後續動作，但是我卻從年輕男人那裡看

到不少曙光。某個大學生物相關科系的男生在班上成立一個娘娘腔的小團體，他們的溫柔甚至讓班上女生稱讚不已。輔大心理系也有男性研究生成立男性團體，進行持續的討論，並據此撰寫幾篇相關的碩士論文。半年多前我也與一群年輕的男性展開定期的成長經驗的分享，他們互相傾聽、支持與挑戰，願意反省自身做為男人的種種處境，讓我深深感動。劉惠琴文中對男人的改變，感到既無奈，又有許多期許。作為性別結構中優勢的男人，是該加把勁了，千萬不要與性別改革錯身而過，更不要成為絆腳石。「義利之辨」，要深思，要實踐啊。（2003 年 5 月 15 日收件，作者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一文作者）

兩性相處的再學習

朱蘭慧

首先要謝謝高淑貴教授、劉惠琴教授、洪久賢教授及蔡篤堅教授先後對我〈男性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之形成與鬆動〉一文做出回應，當中的回應內容及肯定之語，給了我莫大的鼓勵，尤其是蔡篤堅教授的回應，像是給我打了一支強心針，我也冀望在未來，在性別之路，有機會繼續為性別研究出一份力量。

我在未走入性別領域之前，無疑地也是一個性別盲，而且生活得很理所當然。因為，一切看起來就是那麼地理所當然，也很少會對身邊的性別事件有所質疑。爾後長出性別之眼的種種歷程，便是再一次地印證自己的經驗：婦女覺得傳統的思想模式沒什麼不好，但如果嚐到平權的滋味，未必會不喜歡。婦女意識與研究日益茁壯是一件好事，相對地也該開發男性研究這塊領土，二者相輔相成，更能快速定位兩性平權的平衡點。

我在此論文的寫作過程中，從與三位研究對象的互動裡，探訪了男性成長的軌跡，也約略初探了男性之所以成為「男性」的種種理由和過程，更可以很確定地說：「男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如同『女人』的角色一樣」，是被「制約」而後形成的。我們常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有很多的行為都是因為「習慣」而產生的，只要適當地製造「再學習」的機會，同樣可以有「新的習慣」產生，包括兩性之間的相處模式。在研究所就學期間，系上的教授曾在課堂裡對大家提過切身的經驗：想要改變一個人，有二個時機是最可能奏效的，一是男女朋友交往熱戀期；一是新婚時期，過了這二個階段，要再改變一個人，就顯得相對